

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作家两性关系书写

王文胜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学院型女性作家对两性关系的书写反映了当今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其中有令人欣慰的地方,比如潘向黎在小说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也有值得重视的社会病症,首先是“厌女症”的复活,其次是对两性关系的实用主义态度;除此之外张悦然和孙频都注意到变态人格对两性关系的影响,这些都拓展了我们对复杂人性的认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大多都未能书写持久美好的爱情关系,连健康而热烈的性爱关系都很少涉笔。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仅仅从当下社会的快餐文化、技术主义、互联网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来理解,更重要的还应该从中国百年以来社会思潮发展的整体脉络上来反思这个问题。

关键词 新世纪 学院型女作家 两性关系 潘向黎

王文胜,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两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持续走低的结婚率和同期不断上升的离婚率;其次,中国离婚案件中,案件原告中的女性人数远远高于男性^[1];第三,近年来高收入、高学历的女性遭遇“婚姻挤压”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中国大陆两性观念的变化。一百年前,“恋爱”“离婚”等这些反映两性关系新变的词汇在中国传播,引发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考察新世纪以来两性关系是如何进入小说书写的,也是审视新世纪文学价值观念的重要角度。本文选取学院型女作家作为讨论对象,一来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在两性观念方面发生变化最大的是女性;二来即将涉及到的这几位学院型女作家都拥有硕博学位,从知识结构上来看她们更具备自觉反思性别意识的能力。本文重点考察学院型作家中60后女作家潘向黎、阿袁,以及80后作家张悦然和孙频。

[1]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离婚纠纷司法大数据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73.40%的案件原告为女性。参见王春霞《离婚案件原告为何七成是女性》,〔北京〕《中国妇女报》2018年6月21日第004版。

—

阿袁在高校任教授,主攻古典文学。她惯于将两性关系作为大学校园的众生相来书写,她消解了象牙塔的庄重神圣,将其完全世俗化。她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男性沉溺于“艳遇”,而女性甘于自我物化。她塑造的女性形象最常见的是这样两种类型:一类以郑黎、吕蓓卡为代表,她们擅于利用自己的外貌优势来获得资源;一类以齐鲁、小颜为代表的,她们姿色平平,落寞孤寂。阿袁津津乐道于郑黎们的长袖善舞,却刻薄齐鲁们的剩女愁嫁,她的《长门赋》《汤梨的革命》《鱼肠剑》《郑袖的梨园》等小说仿佛是一出出学界宫斗剧,无一例外地演绎着女性围绕着男性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故事。在她眼里,“对女人而言,幸福一半来自男人,还有一半来自比自己更年老的女人”(《汤梨的革命》)。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有本书题为《厌女》,分析了种种“厌女症”,指出“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1]。女人之间围绕男人相互对立、女人以女人为敌人在此书内被归为女人“厌女症”的症状。“女人的厌女症是自我厌恶”^[2]。中国传统的男权文化是培育“厌女症”的最佳土壤。但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经历了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之后,性别观念有不少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会遏制厌女症的蔓延,也能渐渐治愈厌女症,让两性关系、同性情谊都可以往更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然而阿袁的叙事却是一次大大的倒退。《长门赋》中结婚十年的小米和丈夫沈安二十天的拉锯战最终以小米的妥协结束。如果小米是因爱而生的妥协,那倒显出小米内在爱的力量,然而小米的妥协却是出于恐惧,她害怕的终究只是自己的人生最终形单影只。所以小米这样的妥协只是暴露了自己内心的孱弱而已。阿袁笔下的女人大多是出于对单身的恐惧而将男人当江山来攻来守的。《郑袖的梨园》中作者竟然以旁白的声音感慨道:“总以为以自己三十多岁的如花年纪,守一个五十岁的老男人总是安稳。没想到,还有二十多岁的女人觊觎着她手中的安稳。”为了争夺男人的亲睐,阿袁笔下的女性总是互为天敌。阿袁老师在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她透过两性关系的书写活生生地将众女生们劝退回一百多年前强大的男权世界里,让女子重新沉浸做奴隶的小甜蜜与大悲哀中,或是陷于做奴隶而不得的惶恐不安中。

阿袁小说文本中对两性关系的书写暴露了她价值观上的缺陷。吕蓓卡利用自己的姿色成功地换取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寻到了博士论文的捉刀人,甚至别人的丈夫,其无耻卑劣的程度令人发指。阿袁透过吕蓓卡的确也暴露了高校里色相交易这一问题,然而作者对这些事情的叙事态度却是暧昧不明的,最终她也只是将叙事重点放在女性之间的争位和复仇这个层面,未能上升到灵魂层面来展开对死魂灵的批判。阿袁自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后,她的小说文本被多种刊物转载,连续四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获得多种文学奖项,可见其受欢迎度非常高。阿袁的专业方向是古典文学,她小说的叙事语言灵动华美,但她却缺乏用现代精神烛照传统文化的姿态,这使得她的叙事立场仿佛还停留在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女子邀宠这样陈腐的性别观中。她的小说如此受欢迎,从某种程度上可见当今社会精神萎靡、倒退的一面。

二

同为60后作家,潘向黎的小说叙事总体上散发着闺秀气息,温润、保守、不张扬,在性别观念上她要远远比阿袁有现代意识。新世纪伊始,她就以《我爱小丸子》为我们提供了现代都市白领姜小姜这

[1][2][日]上野千鹤子:《厌女》中文序言,王兰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页,第3页。

一女性审美形象。姜小姜在两性观念上毫不扭捏做作,喜欢奔四就大胆地喜欢,但当她明确知道奔四真不爱她后就毅然转身去调整,不纠缠更不纠结,她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潘向黎笔下的女性大多是这样一类形象,拿得起放得下。在《白水青菜》中,女主人的婚姻江山已经风雨飘摇,但是女主人却临危不乱,颇有大将风度。我认为这不是因为她没有彻骨的伤心,而是这个女子心里既有爱情又有独立的人格。相比于在阿袁的小说里女性之间有的只是蝇营狗苟的利益,只有残酷的生存法则,《白水青菜》中就没有女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硝烟弥漫,她“像一个有礼貌的女人对待丈夫的朋友那样”接待了不约而至的嘟嘟,她给她端上精心熬制的白水青菜汤,并仔细地讲解那繁琐到足以吓倒绝大多数主妇的清汤制作程序,她拿出自己对丈夫的爱情给嘟嘟看。

《白水青菜》中潘向黎塑造了一个全心爱丈夫却不失自己人格和尊严的现代女子形象。她可以爱到全心全意,但绝不依附丈夫到失去自我。女主人在家对第三者嘟嘟所行的待客之礼,让我想到潘向黎在她的散文中所说过的一句话,“哪怕是在那样绝望的处境之中,人仍然可以活得有自尊,讲道理。”^[1]即或自己的爱情被藐视,即或婚姻的江山丧失,又不意味着人生全盘皆输,女性的幸福哪里是一只被别人拽在手中的风筝呢?女主人接纳了浪子回头的丈夫,没有一句责备和询问,好像一切风平浪静,而事实上女主人却打了男人一个措手不及,白水青菜露出了寡淡的真貌。女人宣告了自己重返职场,留下那个习惯性地耍威风自讨没趣的男子,《白水青菜》便嘎然而止。这就是潘向黎的深意,男人的归家固然好,但那女子已经不在原地,一个内心变得强大的女子不会以为男人的归家就是自己婚姻保卫战的胜利,要想真正的团圆,他们恐怕还有许多问题要面对。

潘向黎小说中的女性往往都有学识、独立自强,哪怕在最绝望的情伤中她们也会保持着一份自尊和冷静。《穿心莲》中的深蓝和漆玄凯从相识到相知、相爱,他俩的关系从道德而言的确有些瑕疵,毕竟漆玄凯是有妇之夫。但在一份深情面前他们下决心任性一回,“这是他的怀抱,他的怀抱。一下子,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顿了,所有扭曲着的都正了,所有喧闹的都静了,所有凝固的都流动了,所有渴着的都饮了泉水。”这般完美的在爱里的合一让人不忍心对他们发出任何指责。这也是深蓝人生最幸福的峰巅,她以为可以期望在这峰巅之处和她的所爱天长地久,不曾想这却是她和漆玄凯最后的时刻。漆玄凯的妻子自杀了,漆玄凯不辞而别,杳无音信,深蓝几个月的牵挂和翘盼只等来一封简单的分手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手方式对深蓝是重创性的,因为它突如其来,没有逻辑可言,连作者也禁不住为她忿忿不平,“爱情是会伤人的,但是爱得这么短,抛弃得这么不负责任,简直就是杀人,而且杀的是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人,是虐杀。”

在爱情这件事上没有公平可言,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两性对情感不同的态度似乎注定了女性更容易受伤。当潘向黎呈现婚恋中的两性关系时,她笔下的男性都是理性到冷酷的现实主义者,他们绝情起来往往不给女性留有任何余地,即使漆玄凯和深蓝看起来曾那么情深意浓,他也做得到将深蓝“当成切除的阑尾、扁桃体一类彻底废弃”。看到男性“将感情只当作人生的一个频道”,潘向黎对两性关系中女性处境的凶险是有足够认识的,面对这样的性别对手,痴情女性的结局大概是会不死亦伤的。所以她说“女人应向男人学习”,女人若不能潇洒地放手感情,是容易陷入“情伤”的。这样看来,《永远的谢秋娘》中谢秋娘能在男性为主宰的商界游刃有余,靠的并不仅是她的美貌和交际应酬能力,还有她随时能够放下感情的狠劲,即便是对韩定初,在他遭遇不测后她照样能像摔个杯子似的把他的感情甩掉。然而潘向黎也难免疑惑,能如此弃感情而不顾的话,“是女性的进步呢,还是女性的异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除了身体,女人就和男人无异了。”^[2]看来潘向黎既没有和男性对立起来,也没

[1][2]潘向黎:《万念》,三联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第63页。

有希望自己消弭女性气质,她还是有清晰的性别意识的。在两性关系上她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面对两性关系中的不确定,她看到了婚姻制度的积极意义,“婚姻许人三件大事:(一)日日相守。(二)心里踏实。(三)老有所依。不能实现这三件,再浓再痴,也只是感情而已。”^[1]无论是《白水青菜》还是《穿心莲》,她表达的都是婚姻无论好坏,它都有自己的底子,要拿一段婚外情去撼动婚姻,还是很困难的。这样的两性关系书写要认真负责得多。

三

80后女作家张悦然和孙频在书写两性关系冲突方面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最突出的一点是,她们对变态心理和变态场景的偏好与想象力。张悦然的《我循着火光而来》,庄赫因出轨和周沫离异,表面上看这并没有引起周沫多激烈的反映,她却以变态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她内在的伤痛。她和第三者顾晨结成了一种奇怪的电话“情谊”,她在电话里引导酒醉的顾晨哭诉自己被庄赫始乱终弃的细节,甚至他们的做爱,从中获得满足。她假装关心顾晨,事实上却象一个玩耍掌中之物的高手戏弄着顾晨,眼看着顾晨要走出情感漩涡,周沫略施小技就拿顾晨当了砸向庄赫的砖头。

孙频在《无相》中书写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鳏居老教授利用女孩的现实困境和心理劣势进行了性侵,在一个变态事件中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幽暗。作者的精彩在于她描写了一场以“看”完成的性强暴。廖秋良命令于国琴脱光给自己看,也让她看着他自己脱光。这场奇特的性侵中混杂着太多的人性内涵,孤独、恐惧、欲望、良善和权力等等,让我们看到人性善和恶的交织。《无相》的结尾颇能显现孙频大女子主义的倾向,于国琴抓住了廖秋良性暴露和性窥癖的心瘾,主动出击,脱光了自己的衣服,以自己年轻的酮体挑衅那位冒犯她的老者,使对方在强烈的性诱惑下心脏病发作死去。

张悦然和孙频的小说文本对两性关系中的冲突、混乱的书写,往往重在表达生命个体内在的挣扎,她们对更为具体的两性间的情感并不感兴趣。她们的小说文本即使写性,也不是为了写爱情,而是以性为隐喻,来书写生命中最幽暗处的疼痛,书写创伤性事件对女性成长的阻隔。张子屏(孙频的《抚摸》)在少女时期因父母意外死亡被姑姑收养,期间多次遭遇姑父性侵,从此,“无论她丑陋执拗的肉身怎样试图去拥抱这个世界,她那住在肉身里的灵魂始终是游离的,是与她的肉身隔岸观火的。”那被性侵的少女成为张子屏内在停止长大的小孩,她渴望通过性和外界发生某种联系。当她遭到男人的拒绝时,她会恐惧整个世界都离开她了,于是宁愿践踏自己的人格也要讨好男人,她和外界建立不了健康的关系,就这样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抛弃她的男人。张子屏和男性的关系已经不是两性之间的吸引,而是她和世界关联的一种方式,她对男性的渴望也无关乎爱情,而是内在那个曾受性侵的少女渴求关注的表达。

除了个人成长中的创伤之外,张悦然和孙频还比较多地注意到重大历史事件对个体原生家庭的影响,而这些也成为她们内在焦虑的原因,影响到她们和外界包括两性的相处。张悦然的《大乔小乔》和孙频的《松林夜宴图》都分别书写了计划生育政策和上个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对个体家庭的影响,大乔小乔的父母当年因为医生引产失败,生下了二胎受到处罚,夫妻双方被开除了公职。从此他们就走上了上访之路。二十多年来,这对夫妇被遭遇不公对待的委屈感折磨得坐立不安,无法正常地谋生和抚养孩子,上访以洗白冤屈似乎就成了这个家庭生存下去的使命和意义,大乔二乔的人生也一直笼罩在这件事的阴影之下。成年后的大乔不得不继续家庭的使命,为此不惜恋爱失败、失掉工作,最后跳河自杀。而二乔虽考上大学远走高飞,但那样特殊的家庭所带给她的羞耻感和自己作为二胎

[1]潘向黎:《万念》,三联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63-64页。

的种种负面心理,一直是她巨大的心理包袱,也最终摧毁了她的爱情。

张悦然和孙频的创作都注重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在生活中被扭曲了的灵魂,尤其是孙频,这方面的自觉追求很明显。同时,她们在小说文本中对心理疾病的把握,对原生家庭影响的书写,对创伤反应的描写都能从心理学找到依据。然而我觉得她们的小说也存在着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情节、场景和人物的性格都有些偏向极端,而缺乏对日常生活中常态人和事的书写,这对丰富的情感呈现是有些伤害的,正如郜元宝所言,“情感的价值外推越彻底,越容易偏离感情的原点,变成某种社会象征和社会寓言,掩盖了千差万别的真情实感。”^[1]

在性别观念方面,80后女性由于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原生家庭中受到重视,而且她们成长的环境中,两性平权的思想影响比较大,社会上女性成功者也越来越多,这些都使得她们追求两性平等的意识更为强烈。张悦然、孙频对两性关系的书写常颠覆传统的性别认同和性别观念,她们改变了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的婚恋观,常见女强男弱、女性主动、女大男小这样的两性关系模式。

孙频的《丑闻》和《光辉岁月》中书写了女博士形象,她们不再是人们眼中具有优越感的人,而有着自己的“一地鸡毛”。《丑闻》写的是三十多岁单身女博士张月如的性丑闻。她涉笔了女博士在现实生活中相当窘迫的一个问题,即她们的婚恋问题。中国传统择偶观往往是男强女弱、男大女小,加之社会的性别偏见对女博士的妖魔化,婚恋问题对女博士们而言的确是个难题。而梁姗姗(《光辉岁月》)则是另一类博士的代表。她出生于贫困家庭,博士学位并不能帮助提升她的阶层。焦虑、孤独、无奈是这些具有博士学位的小人物在现实生活挤压下的精神底色,两性关系成为在社会上立足安稳的途径。张月如希望得到好色的院长宠幸,梁姗姗对握有权力的陈天东主动示好献身,她们在这些握有权力的男性面前竭尽挑逗,显得卑微甚至有些无耻。

四

细读新世纪以来这些学院型女性作家对两性关系的书写,我觉得她们的文本还是反映出了当今社会在两性关系方面的发展变化,有值得欣慰的地方,比如潘向黎在小说文本中塑造的女性审美形象,她们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意识,作者透过两性关系的书写表达出的性别意识温柔敦厚又不乏独立精神;也出现了值得重视的病症,首先是“厌女症”的复活,其次是对两性关系的实用主义态度;除此之外,张悦然和孙频都注意到变态人格对两性关系的影响。这些还是拓展了我们对人性丰富性的认识。

然而总体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大多都未能书写持久美好的爱情关系,她们甚至很少涉笔健康而热烈的性爱关系。即使是潘向黎书写爱情的文本,那些短暂的美好也是为了衬托它们的易碎;另外几位作家也未涉笔爱情中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她们的小说文本中,主情主义似乎被排除在外了。何以如此呢?我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仅仅从当下社会的快餐文化、技术主义、互联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还应该从中国百年以来社会思潮发展的整体脉络上来反思这个问题。

早在上个世纪近现代之交时,思想界就讨论了性别解放、自由恋爱、离婚这些涉及两性关系的问题,然而封建传统的伦理思想被批判清理的同时,知识分子们在新文化建设中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新的伦理思想体系,也没有足够深入地讨论性别问题、爱情问题。比如上个世纪初期,知识界在引入“恋爱”这一概念时对恋爱的理解就有“恋爱自由”和“自由恋爱”的区别,“依本间久雄的论述,欧洲主张‘自由离婚’者,可分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物论两大派系:自由主义主张‘恋爱底自由’,社会主义/唯物论派则主张‘自由恋爱’”,杨联芬教授在梳理了两者各自的思想脉络后指出它们的区别在

[1]郜元宝:《“我已经不爱你了!”》,[上海]《文汇报笔会·笔会》2002年6月6日。

于“一是社会主义/唯物派将结婚视为‘不受一点法律底干涉底私的契约’。二是自由派注重‘灵’‘肉’二元的统一,唯物派偏于‘肉’的自由。”而“这种唯物的、男性的、因‘正义’而趋于专断的‘自由恋爱’,一直持续到抗战初期的延安”^[1]。

到1949年之后,爱情的合法性都被悬置了,与爱情相关问题的讨论也就不可能继续深入。新时期以后,中国思想界虽再次有过类似的讨论,当时张洁、张辛欣的小说,像《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在同一地平线上》都引发过人们对爱情、婚姻、婚外情等问题的讨论,然而知识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似乎并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况且在人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未能成为普遍性的价值观时,人们对爱情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洞见。

与此相似,在我们的新文化发展脉络上,作为两性关系重要议题的“婚姻”问题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20世纪初,“恋爱自由”“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成为新道德的具体诉求,在参与摧毁家族制度和传统道德上,所向披靡”^[2],与此同时,“离婚”的观念也被认为意味着进步,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突破,“离婚”被认为是解决婚姻问题的出路。然而知识界也并没有认真思考“离婚”的负面性影响。其实在现实中,“新文化30年间‘自由离婚’的历史,从细节看,离婚并不都那么崇高,结果也未必理想,离而结、结而散的行为,层出不穷,备受诟病。”^[3]至今为止,类似于这样从“离婚”的角度对五四启蒙进行反思的声音并不强大,它完全不能阻拦在婚恋问题上强烈的个人主义思想盛行,发展到如今无论是“恋爱”,还是“结婚”或“离婚”,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在意“责任”和“他人”,一种以自我感觉为导向的享乐主义文化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兴起了。

再言之,我们的文化中缺乏对爱情的严肃思考。中国儒家思想体系中强调“仁爱”,讨论的重点是君臣、父子、同辈之爱,谈及夫妻之爱,也不过强调妻以夫为纲。中国虽也有很大胆的书写“性”的小说《金瓶梅》,但谈论“性”始终是我们文化中的一个禁忌。我们不曾有过像弗洛伊德等西方学者那样对性与爱欲有专门的研究,也没有能从形而上的角度认识到“性高潮常常作为死亡与重生的象征”^[4]。虽然中国伟大的小说《红楼梦》描写了爱情,但因其本质上对虚无的认同,并未能提供一个积极的爱情观。

此外西方一些关于爱、爱情、爱欲研究的著作,像瓦西列夫的《情爱论》、舍勒的《爱的秩序》、克尔凯戈尔的《爱之诱惑》、罗洛梅的《爱与意志》虽然都被译介过来,但这些思想学说还没有成为我们中国现代思想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我们也缺乏对爱情进行阐述的本土思想资源,二十世纪以来的新文学是缺少经典的爱情书写的。而且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兴盛,身体书写、欲望书写都大有替代爱情书写的势头。作家之所以越来越失去了对爱情的信心和表达力是在百年社会思潮的变化中找到原因的,它与“五四”以来新的“婚恋”观念在被引介到中国内地时,不断遇到不同时期特有语境的影响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未能对“爱情”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关系。

或许是这个时代太过实际,或许这个时代人的情感特征就是焦虑、冷漠的,以致于爱无能;或许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欲望、实用性功能替代了彼此的相爱,然而我始终认为爱情是不愿向无趣、平庸的现实妥协的一种表征,也是一种对人性美好尚有一些存留的信心,是对虚无主义最有力的反抗。越是在冷漠、虚无情绪主宰人们内心的时代,我认为作家越需要有一种使命感,带给人们对美好感情的咏怀和盼望。

[责任编辑:平 啸]

[1][2]杨联芬:《“恋爱”之发生与现代文学观念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3]杨联芬:《“自由离婚”:观念的奇迹》,[北京]《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

[4][美]罗洛梅:《爱与意志》,宏梅、梁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